

法國近代知識分子的在野與參政 ——德雷佛斯訴訟案百年

● 陳 彥

一百年前，法國一名在總參謀部任職的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上尉軍官德雷佛斯(A. Dreyfus)，因一洩密事件被判終身流放。由於案情審理草率，證據不足，而且一些主要物證都沒有公之於眾，從而引起社會各界的不滿。兩年後，隨着案情真相的進一步披露，社會要求重新審理德雷佛斯的呼聲日趨強烈。很快，整個法國社會都為此案件攪動，德雷佛斯上尉個人的命運幾乎牽動了法國整個政治舞台和全體知識界。這即是在法國近代史上影響深遠的德雷佛斯訴訟案。今年是這一事件一百周年紀念，配合這一歷史回顧，法國出版界推出有關新書和重刊舊籍，總數當以千計，盛況可觀。

紀念德雷佛斯事件與 反省知識分子作用

今年出版界推出的著述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重版當年的歷史著

述，如德雷佛斯的《五年刑期生活自述》由發現(La Decouverte)出版社重版；斯托克(Stock)出版社再版了當年該出版社創立人斯托克(P.V. Stock)的《德雷佛斯事件——一個出版商的備忘錄》；當年左拉(E. Zola)以德雷佛斯事件為背景的小說《真理》，以及另一位當時積極維護德雷佛斯的重要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朗士(A. France)的《企鵝島》等文學著作都獲得再版。

二是對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以及相關的社會背景，繼續進行正本清源的實證性的專題歷史研究。這方面的收穫頗豐，除再版已有定論的大量研究著作外，新推出的書籍中也有不少力作。值得注意的有該事件研究專家德瓦茲(J. Doise)的《一個嚴守的秘密——德雷佛斯事件的軍事背景》，還有比恩鮑姆(P. Birnbaum)主編，集十六位大學專家之力，由伽爾馬(Gallimard)出版社的著名《歷史文庫》叢書推出的《德雷佛斯事件時的法國》，杜克



一百年前，法國一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上尉軍官德雷佛斯，因一洩密事件被判終身流放。整個法國社會都為此案件攪動，幾乎牽動了法國整個政治舞台和全體知識界。這即是在法國近代史上影響深遠的德雷佛斯訴訟案。圖為德雷佛斯。

雷(V. Duclert)的《德雷佛斯事件》，以及九月份將出版的兩卷本的由德魯安(M. Drouin)主持的《德雷佛斯事件大全》等等。尤其值得介紹的，是一部由伯恩斯(M. Burns)撰寫的《一個法國家庭的歷史：德雷佛斯家族整合、事件、維希》的專題研究，既是一部紮實的實證研究，又跳開了就事論事的窠臼。作者在參照大量史料的前提下，將德雷佛斯放進其雙重家族背景(他既有猶太人血統，又有法國血統)中去考察，既揭示了德法民族間衝突的根源，又反映了一個猶太家庭向法蘭西民族融合的千年過程。同時，該書也使一些曾經爭論不休的問題迎刃而解，如德雷佛斯雖遭冤獄，他本人一直不停地上訴，要求平反，但他

從來沒有對法國軍隊有過怨詞，相反，他一直為錯判他的軍隊進行辯護。該書作者通過對其家庭整合於法國社會的歷史的調查，清楚地揭示了這一猶太家庭對法蘭西民族的深厚情感。

第三方面是就這一歷史事件而進行的歷史的反思。在這方面，一些學術性雜誌最為敏感。知識分子史雜誌《一九〇〇》93年11月為此推出專號，約請多方面的著名史學家，對曾經捲進這一事件中的知識分子如左拉、普魯斯特(M. Proust)、社會學家杜爾凱姆(E. Durkheim)、畫家德加(H.G.E. Degas)、作家兼政治家巴雷斯(M. Barrès)等進行個案分析，尋求他們何以在當時會選擇不同立場。同

時《歷史》、《猶太檔案》等刊物也已推出有關專號。在這些對歷史進行反思或詰問的著述中，大約也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對猶太人的歷史地位和反猶主義的思考，如史學家本蘇森(G. Bensoussan)的《逆反的意識形態——對亨利紀念碑的調查或法國十九世紀反猶情緒的考古》；另一類是對知識分子作用的反省。較為重要的有巴拉爾(M. Balard)的《中世紀的世俗知識分子》，加耶(A. Caillé)的《知識分子的方向》等。從更為廣泛的意義上講，布迪奧(P. Bourdieu)與雕塑家海亞克(H. Haacke)的對話體新作《自由交換》^①，也可以算作對知識分子作用的反思一類，但布迪奧此書與其說是對歷史的反思，不如說是對知識分子未來作用和定位的一個建議。

在此方面尤為值得一提的是法國科研中心研究員利斐爾(R. Rieffel)的大部頭著作《文人部落——第五共和治下的知識分子》^②。首先需要說明的是這裏的「文人」(法文原文Clerc)一詞，中世紀時僅指接受過剃髮禮的教士，十五世紀以後才漸漸演化成有知識之人、學者的意思。法國學術界習慣上沿用此詞泛指知識分子，大概同知識分子的定位一直曖昧不明有關。利斐爾在書題中選用Clerc和部落(Tribu)兩個意義不甚分明的詞，原意之一便是希望表明當代知識分子作為整體的變動不居和難以掌握。該書斷代從1958年法國第五共和建立至1990年，可以說選擇了知識分子史研究中難度最大的時段和當今社會又最需要把握的時期。

作者承認，這一時期知識分子的「景觀是無法從整體上把握的」，但儘管如此，作者仍傾其全力分析梳理，企圖以翔實的調查材料和細密的實證方法來為進入這一「神秘世界」(作者語)提供一個指南。作者主要從兩個角度來把握知識分子：一是知識分子之所以成為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既非血緣承襲，又非一種社會身分，他需要社會的承認；二是知識分子與政治、政權的關係。

從第一個角度，作者以大量的事實、證據，為讀者勾勒出一幅條分縷析的法國當代知識分子活躍其中的社會、制度網絡圖。在這一網絡中，不僅包括如全國教師會考等制度化的縱向的升遷途徑，也包括多種學術團體、學術雜誌、討論中心等橫向的聯絡渠道，甚至那些名噪一時的各種名人會聚的咖啡館、酒吧等，都沒有逃脫作者的視野。作者自認為是以人類學的方法進行社會學的研究，以一個旁觀者的眼光，在描摹這一幅錯綜交織的社會網絡圖時，將法國知識分子藉以競爭、升遷、操作、影響的社會機制呈現了出來。這正是本書最成功之處，也正是由於此，此書將成為今後法國知識分子研究領域不可或缺的參考書籍。

至於第二個角度，即知識分子與政治、政權的關係問題，正是近來法國學術界的熱門話題。本書作者自然也給予了充分的注意。面對東西冷戰的結束，意識形態的終結，知識分子藉以定位的歷史參考已漸隱退，現實的路標也已模糊不清，傳統上法國知識分子的政治左

利斐爾的《文人部落》，以一個旁觀者的眼光，在描摹一幅錯綜交織的社會網絡圖，將法國知識分子藉以競爭、升遷、操作、影響的社會機制呈現了出來。這本書是今後法國知識分子研究領域不可或缺的參考書籍。

傾趨向似已無識別意義。《二十一世紀》今年四月號關於法國當代藝術標準的討論的一系列文章，正反映了當今意義世界失落的一個側面。《文人部落》一書作者在書中提出了劃定和影響知識分子的兩個新因素，一是自由主義的「革新知識分子」與「整合的知識分子」之別，前者往往是執政黨的反對派，後者則往往支持執政者；二是意識形態淡出之後，大眾傳媒似乎有取而代之的趨勢。對於知識分子說來，傳媒本身並不能填補意義的失落，但卻對知識分子的升遷、知識與思想的傳播，具有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從社會的良心到政治參與

從德雷佛斯事件一百周年到有關知識分子作用定位的討論，看來似乎並沒有必然聯繫，但其實正是知識分子的「介入」，才使到這一事件獲得了深邃的內涵。圍繞着德雷佛斯事件，法國分成了兩個互相對立的陣營，主張重新審理德雷佛斯和主張維持原判的兩派旗幟鮮明。知識界大部分都站在德雷佛斯一邊，力主伸張正義，探究真像，維護公正。通觀整個事件經過，知識分子是動員社會力量，站在弱小的一方，維護人權基本原則，他們是批判現存政權的中堅和先導。德雷佛斯事件之所以能夠從一個單純的刑事錯判案件，發展成為一個聲勢不凡的維護社會公正、保衛個體權力的社會運動，正是因為有了知識分子這個「靈魂」。同時，也正是借助於這一內涵深邃而又影響廣泛的

典型事件，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的良心」的聲譽和職責獲得了再一次的彰顯和深化。

在法國知識分子史上，德雷佛斯事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法國理論界後來有人認為，這一事件標誌着現代意義上的法國知識分子群體的正式誕生。將這一事件看作是法國知識分子群體的產生，無疑過分誇張了該事件的歷史重要性，未免失之偏頗，但卻也表明該事件為知識分子在社會功用層面上，留下了重要的社會資源。

知識分子常被稱為「社會的良心」，但這一稱謂易使人誤以為知識分子可以超脫於社會、超脫於政治。實際上知識分子從來不滿足於僅僅作為「良心」來反省社會、批判實現、捍衛理想的價值準則，他們總是以各種方式推動這些價值付諸現實。換言之，西方近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一出現，便是相對於現實政治而存在的，他們或者站在社會的一極批判政權，或者站在政權的一極，力圖將理想變成行動。我們不妨將這一現象稱作知識分子的「在野」與「參政」的兩極震擺。

通觀法國自十八世紀以來的知識分子史，在野與參政二者間的震擺現象構成一個有周期可尋的運動。在野，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是政治權力的反對派，是現存秩序的批判者。參政，知識分子則積極推動自己信仰的價值觀的實現，他們或者進入代議機構，以議會為舞台影響政治決策，或者直接進入內閣執掌行政權柄。法國十八世紀的知識分子屬於前者，十九世紀的知識分子則屬於後者。

德雷佛斯事件之所以能夠從一個單純的刑事錯判案件，發展成為一個聲勢不凡的維護社會公正、保衛個體權力的社會運動，正是因為有了知識分子這個「靈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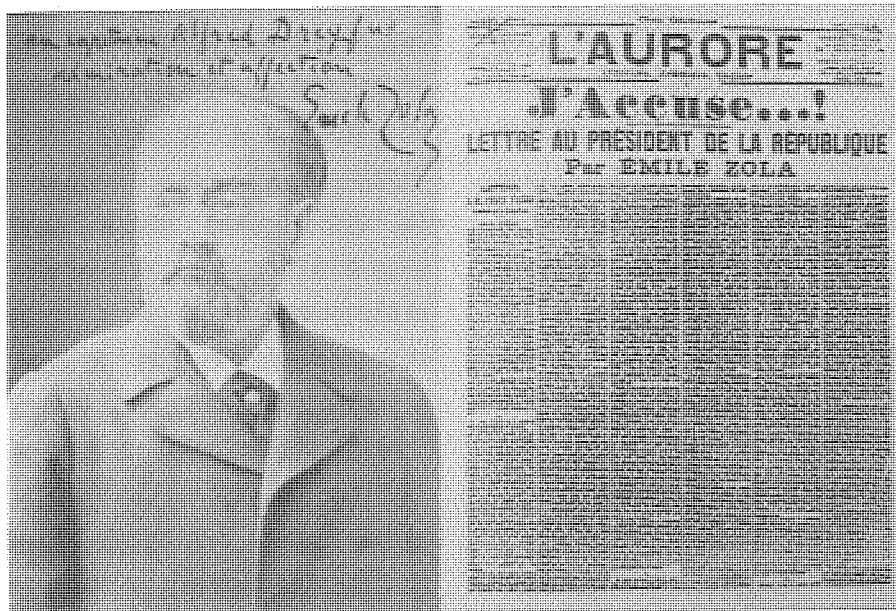
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們面臨的任務是摧毀舊秩序，他們의思想和言論在現存政權的維護者眼中是危險的。伏爾泰(Voltaire)曾於1717年及1726年兩次被關進巴士底監獄，遭人痛打、流放；狄德羅(D. Diderot)因《盲人書簡》於1749年被監禁；拉美特利(La Mettrie)被流放；愛爾維修(Helvetius)被撤職污辱，其《精神論》一書被查禁；盧梭(J.J. Rousseau)遭拘提被逼出逃，其《愛彌兒》一書也遭焚毀；《百科全書》於1752年由國王御前會議明令查禁。如果說，啟蒙思想家們的呼號成為轟轟烈烈的法國大革命的前奏的話，那麼十九世紀法國知識分子則在著書立說的同時進入政界，亦詩人，亦政治家，亦學者，亦部長。十九世紀法國文壇浪漫派魁首雨果(V.M. Hugo)在出版《巴黎聖母院》(1831年)和眾多詩集之後，於40年代初將精力轉向政界，1848年以自由民主派政治主張進入議會，1852年路易·波拿巴(L. Bonaparte)上台後他雖被流放，但仍以其多產與傑出的作品影響着法國民眾。在其創作生涯的後期，雨果雖再也沒有進入政壇，但其詩人兼領袖的信念反而更加堅定，他所謂的「天才即大臣」，詩人的天職乃引導大眾走向真理等思想便是證明。雨果晚年成為法蘭西人民的名副其實的精神之父，他是此時期知識分子、詩人、政治家的典型代表。與他同時的詩人拉馬丁(A. de Lamartine)、大作家夏多布里昂(V. de Chateaubriand)、歷史學者托克維爾(A. Tocqueville)等，都曾經出任過外交部長。最具戲劇性

的是集學者與政治家於一身的基佐(F. Guizot)的生涯。他於1812年年僅二十五歲之時便已成為索邦大學的近代史教授，1814年進入政界任內政部部長助理(僅次於部長)，兩年後調任司法部任同職。1820年後被免職，他回到大學，以十年完成《代議制政府起源史》等歷史巨制。30年代七月王朝建立，基佐旋即出任內政部長，後歷任教育、外交部長一直到行政院主席(相當於總理)。從1830至1848年的十八年間，基佐是其時法國政壇上的最重要的領袖人物。1848年革命他被逐下政壇後至1874年的二十幾年中，他又完成了七卷本的《回憶錄》，其史料和學術價值都彌足珍貴。

十九世紀法國知識分子的政治參與，不僅同十八世紀啟蒙哲學家的思想批判形成鮮明的對照，更為有趣的是，這一政治參與的趨向正是在德雷佛斯事件之時獲得了根本性的扭轉。在這事件中一直站在德雷佛斯一邊的名作家左拉，是知識分子的代表和首領。當1898年左拉在《晨旦報》上發表震動一時的名文〈我控訴〉時，他所要控訴的對象顯然不僅僅是錯判德雷佛斯上尉的有關軍事機構，而是針對一切有違公理正義之現象。當他自願入獄服刑一年之時，其維護的自然也不僅僅是德雷佛斯一個人的權利，而是為普遍的人權價值準則獲得尊重而奮力抗爭。從現在看來，左拉的〈我控訴〉也是知識分子作為人類普通價值準則維護者，所發出的時代聲音。

然而這一時期並沒有持續多長，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又使知識

知識分子從來不滿足於僅僅作為「良心」來反省社會、批判現實、捍衛理想的價值準則，他們總是以各種方式推動這些價值付諸現實。



1898年左拉在《晨旦報》上發表震動一時的名文〈我控訴〉時，他所要控訴的對象顯然不僅僅是錯判德雷弗斯上尉的有關軍事機構，而是針對一切有違公理正義之現象。

分子的震擺盪向了政治參與一邊。共產主義在蘇聯落地所激起的耀眼的理想光環，將知識界引向了對地上天國的由衷的憧憬，同時旋即而來的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和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等政治事變，都強化了知識分子對共產主義海市蜃樓式的將來的信奉。50年代前大部分法國知識分子，或者說他們中間最傑出的部分，都是共產主義的忠誠信奉者。哲學家尼桑(P. Nizan)、勒斐伏爾(R. Lefebvre)，詩人阿拉貢(L. Aragon)，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紀德(A. Gide)都加入了法國共產黨。薩特(J.P. Sartre)雖然一直沒有進入黨內，但宣布是法共的同路人，並由於政治信念的分歧而與同學兼同事阿隆(R. Aron)決裂(薩特與阿隆曾共同發起創立《現代》雜誌)。法國知識分子群體向左傾斜，為某種政治的意識形態所左右的現象，自然也受到少數人的質疑。1927年自稱為「自由人」的法國作家本達(J. Benda)，推出火藥味很濃

的小冊子《文人的背叛》，譴責知識分子放棄維護理性原則的天職，自動退出社會批判的崗位，依附於特定的政治的或意識形態的權威之下。他認為這是知識分子對自己歷史使命的背叛！然而發人深思的是這位在1927年高呼背叛的本達，在其生命的晚期(40年代後)，也開始為蘇聯的所作所為進行辯護。

法國當代知識分子為意識形態所左右的趨向，一直要到70年代蘇聯在斯大林治下的專制暴行大白於天下之後，才發生根本改變。1979年6月26日，為援救越南「船民」，薩特與阿隆握手言和，被一些輿論看成是知識分子由政治參與向理性、人道原則回歸的歷史性標誌。80年代末以來，共產主義世界的崩毀，給西方精神生活層面留下了巨大的空白。東西對壘的世界戰略態勢的結束，第三世界的淡出，歐美的經濟不振，亞洲脫穎而出，西方社會結構失調等一系列事變，一下子將知識分子扔進到一個全新的環

自費爾巴哈以來，知識分子的首要作用不是解釋世界而是改造世界，而今天正好反過來，當務之急乃是解釋世界。

境。歷史不僅沒有終結，而是令人難以置信地加快了進程，作為「社會的良心」的知識精英，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挑戰。如何面對和解釋瞬息萬變的現代社會，已成為目前知識分子的第一要務。以研究影視傳媒的社會功用而異軍突起的社會學家德布瑞(R. Debray)最近說，自費爾巴哈(L.A. Feuerbach)以來，知識分子的首要作用不是解釋世界而是改造世界，而今天正好反過來，當務之急乃是解釋世界。無疑，目前法國知識界正醞釀着一次功能取向的大轉變，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從傳統的「在野」與「參政」兩極震擺中跳出來，掙脫出政治的束縛，以思想直面人生，直面社會。法國輿論將他們稱為第三種類型的知識分子。然而，這一新取向是否意味着傳統以政治為軸的「在野」與「參政」模式的最終結束？知識分子是否會永遠滿足於解釋世界而放棄改造世界的使命？顯然，現在作結論還為時尚早，但今天的社會巨變帶來的知識分子作用的轉換，是否意味着自十八世紀啟蒙時代以來的一個大循環的結束，知識分子目前正處在新一輪循環的起點上？

廣而言之，法國出版界利用德雷佛斯事件一百周年推出眾多紀念和反思著述，也同目前知識分子轉向的大背景息息相通。

法國知識分子與 中國士大夫的參照

總體來看，法國知識分子的「在野」與「參政」的兩極震擺運動，

可以歸納為四個不同的階段。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是知識分子理性批判的始發階段，隨之而來的法國大革命及其正反兩方面的後果，將十九世紀的知識分子推向政治參與一極，這是第二階段。緊接着，隨着普法戰爭(1870-1871)結束而漸趨成熟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又一次引導知識分子向理性批判一極滑動，到1894年德雷佛斯事件後而趨於這一極的巔峰。然後是從1917年十月革命開始，直到70年代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沒落的政治參與階段，嚴格說來是意識形態參與階段。按照知識分子同社會、政治的定位來分析這一周期性運動，可以看到每當知識分子「在野」之時，他們一般都站在社會一邊，批判現實政權，維護普遍價值；而當他們「參政」之時，他們則力圖將思想變成行動，成為其奉信的價值體系的實際推動者。

若以法國知識分子在近代以來的兩極震擺現象來跟中國古代的「士大夫」階層相比照，我們將發現彼此有一些相類似的方面。法蘭西知識分子雖然沒有中國士大夫「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理念，但也存在着在官與在民一身二任的傾向。不過，法國知識分子無論在官還是在民都似乎有着獨立的人格和獨立的理念。近代多元的意識形態給他們提供了選擇，西方的政治舞台為他們準備了活動空間。在民的站在理性批判立場上的啟蒙思想家，和以左拉為代表的十九世紀末年的知識分子的獨立性自不待言，處於「參政」階段的知識分子進入內閣也並不一定和政府政策保持一致。托克維爾在七月王朝和1848

年革命政府中都任過職，他奉行基督教民主派的政見而終生不悔。基佐為七月王朝的最重要的政治活動家，他主持制定法國近代最重要的教育自由立法之一。法國當代的知識分子雖然面對強大的理想主義的時代潮流，曾經為善良的願望托舉而上，一時脫離了理性的原則，但他們並沒有出賣自己的靈魂。薩特從未加入法共，只宣稱他是同路人；梅羅·龐蒂(Merleau-Ponty)規定自己同法共的關係準則是「理解但不加入，自主判斷但不貶低」；甚至在共產主義信仰上走得最遠的阿爾圖塞(L. Althusser)也對馬克思主義作了創造性的詮釋，以上種種都可以印證這一點。

相比之下，中國古代的士大夫在官在民似乎都主要是現存秩序的擁護者和奉行者。認同而不是叛逆，依附而不是獨立，也許是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同西方近代知識分子的最本質的差別。同時，以法國知識分子為代表的近代西方知識分子，無論是在官還是在民，都表現出一種積極的入世精神。在野，他們是現實秩序的批判者，是政府的反對派，甚至比他們入閣執政更充滿着戰鬥力。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可以將法國知識分子群體的在野與參政的兩極震擺都看作是參與，只不過一極是人道、理性的參與，一極是政治和行動的參與。這同中國古代士大夫在仕途不達之時退居山林、江海餘生的消極遁世哲學也大異其趣。

當然，我們在這裏無法仔細對中國古代士大夫和西方近代知識分子作系統比較，因為他們不僅各自

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會環境，而且也不是同一社會發展階段上出現的社會群體。如果要將中國的士大夫階層來同其相應的時代的社會群體對照，那就只有歐洲中世紀的僧侶和武士兩個階層可相比。二者都產生於自己的社會體系並服務於這個體系，並都不可避免地同自己的體系一同走向消亡。西方近代的知識分子不脫胎於僧侶或武士階層，他們之間沒有傳承關係。西方近代知識階層起源於商品經濟的發達和社會分工的細密，近代城市的興起孕育了近代的大學，也孕育了近代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出現正如近代商業城市的勃起一樣，一開始便是外在於西方中古封建體系的，即是說知識階層在本質上是封建體系的摧毀力量。

中國古代社會體系的崩毀，是由於外來的衝擊，到今天，中國經歷了一百五十多年的艱苦多難的尋找近代化的歷程之後，是否已經擁有了自己的有近代意識的知識分子階層呢？這確是一個頗值得我們玩味的問題。

註釋

① Pierre Bourdieu et Hans Haacke: *Libre-échange* (Seuil-Les Presses du réel).

② Remy Rieffel: *La Tribu des clercs: Les intellectuels rous la ve République* (Calmann-Lévy/CNRS).

認同而不是叛逆，依附而不是獨立，也許是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同西方近代知識分子的最本質的差別。

陳彥 法國巴黎大學歷史學博士。